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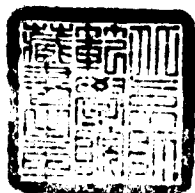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 1895—1912

〔澳〕 骆惠敏 编

刘桂梁 邹 震 译
张广学 石 坚
严四光 俞振基 校



知 识 出 版 社

上 海

1101737

序

黎 澍

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先生所编《莫理循书信集》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与近代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外国私人档案资料集。当事人的私人档案是重要历史资料的一种。一般说来，这类资料虽因限于个人见闻所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但内容比官方档案更为具体，包含许多细节。这是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所不可缺少的。同时，它还常常载有正式文献中所没有的内幕材料。当事人私人档案资料的可靠性高于回忆录，对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私人档案资料，编印了不少有史料价值的私人日记、书信和其他档案材料。不过已经出版的大都是中国人的材料。这还不够，还需要介绍外国的有关材料。尤其研究中国近代史，更是这样。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这方面引起大家的兴趣。

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中国同列强侵略者间的矛盾冲突和各种形式的交往。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都有外国人插手其间，横加干涉，乃至发展为对抗。因此，在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公私档案及其他文献材料中，存有大量足以说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另一面的内容，是中国所没有的。要全面研究中国近代史，清理其中的许多复杂关系，就不仅要掌握中国材料，同时也要掌握有关的外国材料，对事实作多方面的考察。如果只看中国材料，对外国材料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认识就难免片面，甚至会作出不合事实的判断。在外国材料中，首先要注意的当然是政府和某些社会组织保存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不能忽视散

见各处的私人档案资料。我们应当下决心派人出去做细致的收集工作，并尽可能翻译出版。这项工作要求有关的领导有眼光有魄力，做出通盘规划，认真贯彻执行。此事所费无几，但是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尽管其他方面浪费很多，也没有在这方面付出一点点小小费用，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是应当抓紧去做的，所以至今仍然做得很少，很零碎。近年出国的人，往往既没有给他们收集史料的任务，也没有给他们收集史料的必要费用，一般只带回一点自己关心的问题的材料供个人使用；而国内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出国，加上语言文字的限制，广泛阅读和利用外国的有关史料仍旧难乎其难。在这种情况下，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象本书这类已经编辑成册的外国私人档案资料，就显得更为必要。

莫理循自一八九七年起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辛亥革命后作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活动了约二十年光景。这二十年中，正值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社会进入空前动荡和急速变化的时期，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也迅速加剧。活跃于中国政治中心的莫理循，是一个富有政治头脑，忠于英帝国主义利益，又善于刺取情报，活动能力很强，以致被他的上司誉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的人，这就使得他的往来函电和各种备忘录内容丰富，对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很有帮助。

本书有很大部分的内容，是莫理循和《泰晤士报》领导人以及其他外国人讨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活动，以及列强对华政策的通信和备忘录。他们的观点大都具体而露骨，很少掩饰。阅读这些材料，会更真切地看到列强侵华活动的真实企图和多变的手法，从而有助于防止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得过分简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利。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现实的利益。怎样对自己更有利就怎样干，这就是他们的原则。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反动政府并非事事支持；对于中国的进步事物也不是一律反对。原因就在于有时候这种支持或反对被认为不符

合他们侵华的利益；而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当然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例如，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莫理循和他效忠的英帝国对袁世凯称帝就不以为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维护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是由于他们认定袁氏称帝会再次引起动乱和革命，并破坏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此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常常影响他们对华的具体立场和政策。因此，对列强在华活动作真切的了解和分析，显然比从概念出发，更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进步所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尽管莫理循对中国内部状况的观察和认识很不深入，有时还相当迟钝，但从这部文书集里仍然可以读到不少反映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材料，其中还有若干关于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反袁斗争的很足以说明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蔡廷干去武昌和革命军代表谈判归来向莫理循介绍谈判情况的记录；同年十一月七日严复阐述他对武昌起义和中国前途的看法的长信；一九一五年四月孔祥熙报告孙中山流亡日本的情况，并建议袁世凯召回孙中山以瓦解革命党的密信和备忘录；一九一六年六月一日蔡廷干叙述他在当天和已经病危的袁世凯对话的信件，以及记述端纳等人策动李纯武力统一全国的材料，等等。这些读来饶有兴味的材料，虽然不足以改变、但却可以丰富我们对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此外，本书还提供了很多有关国际关系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了解当时列强侵华的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很有意义。

本书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所具有的价值，是和编者骆惠敏先生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分不开的。他为本书所写的详尽注释，为人们阅读和利用本书的材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有的注释本身就是编者认真考察历史的成果。如编者在一个注中依据美国的有关档案资料指出，民国初年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并非如时人和后来的史家所说是出于威尔逊总统的崇高理想，即所谓维护中国的主权，而是由于美国银行团鉴于当时美国金融市场的情况改变了主意，威尔逊不过应银行家们之请给他们提供一个借口罢

了。做这样的注释，并非易事。骆惠敏先生的这种不辞辛苦的精神，是值得取法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译 者 的 话

清末民初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从中日甲午战争后不久来到中国，一共在北京住了大约二十年之久。到1912年为止，他一直任《泰晤士报》记者；其后几年任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

莫理循（1862—1920年）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泰晤士报》说他是“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在他常驻中国的期间（1897—1918年），正值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矛盾的集中点和“冒险家的乐园”。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民国的成立以及袁世凯窃国等等，1919年并曾作为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在英国病逝。

他在常驻中国的大约二十年中，除了曾长期为《泰晤士报》发消息、写通讯之外，还在私下里写下了大量的信札、日记和备忘录等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从侧面或反面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又相互争夺势力范围，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覆灭前对外屈膝投降、对内疯狂镇压革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等许多关键时刻的内幕情况。莫理循这些未曾发表过的私人档案资料，被本书编者、澳籍华人学者骆惠敏先生称为“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从帝国主义的行动与觊觎中了解中国的资料宝库”。

骆惠敏先生从澳大利亚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伦敦《泰晤士报》档案室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处，广泛地搜集了1895—1920年这二十多年间莫理循同他的上司、同事、亲信、友人的往来信件，汇编成《莫理循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两卷,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76年和1978年陆续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

上卷选辑了1895—1912年莫理循任《泰晤士报》记者期间,先后从暹罗、缅甸和中国发出和收到的往来信件五百三十封,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成十五章。其中,除第一章的六封信外,绝大部分是在他任常驻北京记者期间的往来信件。诚如骆惠敏先生在长篇《引言》中所说,当莫理循在1897年初到达北京时,“正是帝国主义烈日当空的全盛时期。那时中国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不久,列强乘虚而入,正在为瓜分中国而竞相争夺。莫理循为了英国的利益,迅即投身进去。但是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命运,而是怎样使英国在这场为控制中国而展开的角逐中取得如意的进展。”因而,“这里所展现的故事,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从1912年8月,一直到1920年病逝,莫理循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政治顾问。这一时期共搜集有关书信436封,按时间顺序分成十章,构成下卷浩瀚的民国初年中国政情要闻选辑。莫理循其人直接成为中国政府公职人员,他的影响却未见增大。

我们认为,评价莫理循其人和评价他所遗留下来的私人档案资料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是两码事。

莫理循其人的政治生涯,一大半是在中国度过的,却始终是站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对立面一边度过的。这位堂·吉珂德式的骑士所宣扬和维护的始终是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其奋斗目标的幻景则是通过中国封建官僚买办阶级,把中国引上受英国控制、照英国模式、沿西方路线实行改良的轨道。

他在华的头十六年(到1912年为止),是直接以充当英帝国主义的前锋和辩护士的姿态出现的。义和团的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是这位老牌“中国通”完全没有料到、使他大为震惊的事件。他不仅始终敌视孙中山先生,诬蔑孙中山先生是“讨人厌的煽动者”,而且简直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多此一举。他恰恰是在辛亥革命的翌年(民国元年)辞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职务而就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

他在华的后六年（到1918年为止）以及带着北洋政府政治顾问的头衔回到英国的最后二年，则是以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教师爷”的面目出现的。早在戊戌政变时，莫理循就曾在《泰晤士报》上公开替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叛卖变法维新运动的罪行辩解，从而与袁世凯结下了不解之缘。迨至辛亥革命以后，在他参与策划的“南北议和”达成妥协，使袁世凯得以窃取革命果实当上了大总统时，莫理循迫不及待地向他的报社上司报喜说：“《泰晤士报》的赌注押对了。”但他没有料到好景不长，曾几何时，他所选中的袁世凯这匹夺魁骏马在称帝失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于是，莫理循的通信再也不象从前那样“自信和倨傲”，却时而出现了“愤懑和辛酸”。其后几年形势的急转直下，更成了他的致命伤。1919年，正当莫理循以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在巴黎出席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和会时，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使他惊魂失魄，从此一蹶不振，卧病英伦，至死也无法理解五四运动的爆发意味着什么。

然而，尽管其人如此，莫理循所遗留下来的私人档案资料，则在客观上有着颇大的史料价值。其中所记述的有关英、法、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侵华的幕后活动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写得生动、具体，提供了不少官方文书讳莫如深的史实。例如，莫理循从李鸿章的美籍机要秘书毕德格（W. N. Pethick）那里获悉的沙皇俄国一系列侵华阴谋绝密情报的内容；日本侵华老手伊藤博文在戊戌政变关键时刻秘密访华的故事；莫理循通过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所进行的种种幕后交易等等，都不失为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

《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十五章，由刘桂梁、邹震、张广学和石坚等同志分别译出，全部译文由严四光和俞振基两同志校阅竣事。下卷十章，由陈泽宪、陈霞飞、许翰和倪彭年等同志分别译出，经陈泽宪和陈霞飞两同志校阅。

为了如实地反映莫理循和与他通信的人的立场观点，以及本书编者骆惠敏先生所写的长篇《引言》和每一章开头的简短前言

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包括他对莫理循的评价),全部译文悉按原文译出。莫氏往来信札,包括发信地点、日期、收信人发信人称呼,悉按原有格式逐译。仅对少数私人生活琐事适当加以删节。

莫氏往来信件中涉及许多历史事件、条约或协定内容、中外政情,在译校过程中尽量查对有关史料,个别冷僻的名称或文字内容未能查到的,按英文译出。

成百上千封往来信件里提到的外国人姓名很多,仅上卷提到的外国人姓名就有八百多个,有好些人同姓不同名,也有不少人是本来就有汉文姓名的,常易混淆,在译校过程中都已根据有关辞书和史料加以核对。极个别的中国人名过于冷僻,无法查到,则按英文译出。

本书原编者所加附注,对信件中提到的人物都介绍简历,翻译时对中国知名人物的简历从略,同时增添了一些必要的译者注。

书中涉及当时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头绪纷繁,内容庞杂。译者限于水平,疏漏舛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目 次

引 言

1895 年 11 月——1896 年 11 月	37
1897 年 2 月——1898 年 5 月	50
1898 年 6 月——1899 年 9 月	103
1899 年 11 月——1900 年 6 月	156
1900 年 8 月——1903 年 2 月	171
1903 年 2 月——1904 年 1 月	246
1904 年 2 月——1905 年 12 月	306
1906 年 1 月——1908 年 1 月	435
1908 年 1 月——1909 年 3 月	528
1909 年 4 月——1910 年 1 月	585
1910 年 8 月——1911 年 2 月	654
1911 年 2 月——1911 年 9 月	698
1911 年 9 月——1912 年 2 月	747
1912 年 3 月——1912 年 5 月	903
1912 年 5 月——1912 年 8 月	947
外国人名中英对照表	974
经济机构名称中英对照表	985

引 言

—

这两卷书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从 1895 到 1920 年的通信选集。上卷和下卷各包含他的一段经历，也恰好同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时期相一致。上卷从莫理循被任命为《泰晤士报》驻外记者时开始，起初在印度支那半岛，然后到了北京，正值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和东亚的多事之秋。这一卷结束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不久莫理循于 1912 年辞去报社记者职务之时。下卷从袁世凯攫取了那次革命的果实，莫理循受聘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政治顾问”时开始，直到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他在 1920 年去世时为止。这就是说，他死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前夕，前者发生在中国国内，后者是国际上试图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尝试。莫理循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正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最为动荡的岁月。

当时处于象他那样有利地位来观察和评论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人为数极少。自然也就没有人能象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那样对当时的事件提供如此充分、生动的记载。撇开政府的档案资料不谈，就同一时代个别人提供的史料来说，不论是中国人或其他人提供的史料，在规模、连续性、范围和趣味性方面，都无法和他的相比。莫理循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并没有勾画出一幅关于这一时期的全面图景，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必要的准确性。但是，莫理循的文字材料，不论是他亲自记录下来的——他的日记、备忘录、文章和笔记，还是他所积累下来的——书信和其

他资料，都有助于把中国历史的一段时期逼真地表现出来。而对这段时期的历史，人们往往并没有充分理解就想当然地认为如何如何。通过对这些纷繁的私人档案资料的仔细查考，从措辞严谨的有关重大政策的文献记载到洗衣帐单和电车票，可以重温那段历史时期有声有色的浓烈气息，这是任何精心构思的官方记录和历史论文所无法表达的。

二

这份为中国历史学家保留下来的丰富遗产本身，说明了莫理循其人和他当时的名望。奇妙的是，莫理循同中国发生联系，完全是出于偶然，那时他不满三十五岁。可是如果考虑到他早在二十一岁时就已成名，这已是相当晚的事了。的确，莫理循除了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着一种对新闻工作的模糊向往和冒险精神外，不象同时代的外交官和传教士那样，他没有受过为了日后在中国发挥作用而进行的培养和训练。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于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季隆城。他是该州著名学校季隆学院院长的长子，他就在这个学院读书。后来他考入了墨尔本大学学医。但是早在他在季隆学院读书后期，他就利用假期开始了横贯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旅行。即使在一个以富有开拓者精神而自豪的国家，这也是杰出的，尤其象他那样年轻的人，更为可贵。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冒着澳洲盛暑，从家乡步行了大约六百五十英里到达阿德雷德，那种炎热气候，非亲临其境者无法体会个中滋味。随后，他又只身划着独木舟沿澳大利亚最大的墨累河顺流而下，这一地区当时尚未开发。这种漫游给了莫理循第一次测验自己从事记者工作能力的机会。他的描述旅途逐日经历、甚至是逐时经历的记录，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显示出他的观察力的敏锐和描写的细致详尽。他的这些特点，后来在他常驻中国的整个经历中始终保持着，但有时表现得过分，也会成为缺陷，正如他日后的《泰晤士报》上司所提醒他的那样。他

在大学的医科学业，由于他在一次考试中提议用过量的药剂治疗梅毒，被迫中辍。于是，他动身到澳大利亚酷热的北部昆士兰州去探险。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他率领了澳大利亚最早的探险队之一，越过托雷斯海峡，到达当时大部分地区尚未探明的新几内亚。他对卡那卡（Kanakanaka）奴隶贸易的揭发，导致英国殖民部对此进行调查，并且在罪行累累的地方官员中引起不小的恐慌和骚动，他们想方设法诋毁他。但是在这些早年的成就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他1882年的徒步旅行。他从澳大利亚最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步行到南端的墨尔本市，没有旅伴也没有指南针，用一百二十三天时间步行二千零四十三英里。他所走的路线，正是二十一年前布尔克和威尔斯所走过的路线。他们当时曾大吹大擂，并且配备有大批人员和物资支援，但却遭到了不幸。他们的失败，成了澳大利亚民间流传最广的话题之一，人们认为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不可能”完成。当莫理循取得成功时，被当地一家报纸嘲笑为一场骗局。这件事却引起了《泰晤士报》的注意——当时还完全没有料到它将来会同这位年青人发生联系——这家报纸把徒步跨越尚未测绘地图的澳大利亚腹地的旅行，说成是“最引人注意的徒步旅行成就之一”。这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其后在中国——他未来寄居的国家，他又完成了一项类似的成就。

1883年，他在新几内亚受了一次矛伤，死里逃生。带刺的矛头在他体内保留了大约九个月，直到他去到爱丁堡时，才由约翰·齐恩教授把矛头从他体内取出。后来，他把1895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献给这位教授。那时，他在爱丁堡恢复了医科学业，两年以后，在1886年完成了全部课程。他怀里揣着毕业证书，又开始了漫无目标的环球旅行，做工自给，从欧洲大陆而北部非洲，而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而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最后到达远东。正是在这次漫游中，由于错过了开往日本的航船，他在1893年转而去了中国。就这样，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他未来寄居的国家。翌年初，他穿戴着中国的长袍和小帽，衣袋里揣着十八个英镑，从上海动身去仰光，行程三千英里，绝大部分

旅程对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他徒步走了大部分路程，在一次严重热病中幸免于难。回到澳大利亚后不久，他又在1895年初乘船去英国。这部书信选集上卷的开篇，就是他写给《泰晤士报》总经理莫伯利·贝尔的信，信中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他当时是怎样同《泰晤士报》发生联系的。

他与中国发生联系纯属偶然，甚至当《泰晤士报》委派他职务时，他首先选择的去处仍然不是中国。他最后被派往北京，不过是要他去试试看。他和他的雇主都没有预料到他会远在中国担任常驻记者十七年，更没有预料到他会独自获得如此立竿见影和持久的成功。他突然成名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在紧接着中日战争之后的岁月里，中国是国际阴谋众矢之的，而莫理循当时是为《泰晤士报》撰稿的。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莫理循具有一个新闻记者处在这样一种地位所必需具备的长处，而这种长处往往是难得的。即使在莫理循的时代，在中国也已经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许多记者，但是没有一个人享有象他那样的声誉，也的确没有一个人配得上那样的声誉。如果说，《泰晤士报》曾经作为发表莫理循文章的媒介而帮助他成了名的话，那么，更加确切的是，正是莫理循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而当莫理循在1912年离职以后，这家报纸的这种声望很快就消失了。

他的特长究竟是什么呢？莫理循不止一次向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诉苦：“我不会写。”显然，他确实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如果说他的笔调缺乏文采的话，那么，他那朴实无华、明白易懂的记述所具有的说服力却足以弥补此种不足而有余。正因为他的文章风格简明易懂，才更显得是出自大手笔。而这一印象与其说来自他的文章风格，还不如说来自他的整个态度。他的冒险活动证明了他的勇气，然而即使在这一方面，他也不是莽撞的，而他在从事新闻工作时绝不是一个冒险家。他热衷于抢先得到“独家新闻”，但他从不耸人听闻。作为一个“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colonial Englishman），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但他总是如实地报道事实，而且不仅仅是从局部角度估计形势。因此他能够象

极少数新闻记者所做到的那样，“以历史家的精确性和政治家的先见之明”，即使只是一名英国历史家的精确性和英国政治家的先见之明，来履行他的职责。这种正直和严谨的品质，尽管有着某些局限性，足以说明，他作为一个“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为什么还能够同那些与他的这一身分相对立的国家的外交官和代表保持个人友谊。这也足以说明，在中国成为世界危机的一个重点地区的动荡岁月里，为什么他从中国发出的消息和见解，还能够为许多国家的当政人物作向导。

这些为他博得如此高度重视的品质，以及他的立意的虔诚，还体现在他所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上和遗留下来的文件上。莫理循一到北京，立即为了自己的参考需要建立起一个图书室，当时他并不知道他要在北京呆多久。不久，他的藏书就超出了他从事新闻工作的直接需要，可是他作为收藏家和版本学家，仍继续收集更多的书。他在这项工作上做得很彻底，使他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极其广博的知识。他象一位细心的图书馆员和档案保管员那样，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更加充分地了解他曾寄居和工作过的这个国家提供了实际帮助。他所收集的文件，不仅证明他生平所享有的权威、影响和名望是当之无愧的，而且证明他致力研究中国的态度之严肃认真。他所收集的文件——我们现在据以出版了这两卷选集——和他所收藏的图书，迄今仍是有关中国的最有用的史料之一，确实构成了莫理循的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在莫理循文件的三个主要部分即书信、日记和备忘录中，这两卷选集所收录的书信有它本身的重要性，而且需要作些解释。

据当时的记载，莫理循似乎是一个不容易被理解的人，无疑，对他不能想当然地看待。不妨设想，他就象他的本国同胞那样，对旁人用拍拍肩膀来表示友好的那种不拘礼节的举止虽也称赞，而自己却不习惯于这样做，他举止端庄，谈吐拘谨，待人接物很刻

板，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对待他。尽管他的外貌和蔼，衣着随便，他的举止却是不苟言笑甚至是冷冰冰的，这同他的幽默感和对儿童与陷于苦境的人的热忱与同情全不相称。他确实是一个性格复杂、甚至不可思议的人物，即使对那些最熟悉他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他的朋友、著名的随军记者莱昂内尔·詹姆斯在莫理循死后不久写道：“你想装作了解莫理循，那是办不到的事”，“甚至那些自以为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们也会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莫理循。”

从莫理循这三种不同种类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性上的不同方面。大体上说，莫理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世界，其中记载着对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的坦率而纯属个人的见解。在日记中，如果说他不宽恕别人，他也不宽恕自己，这种情况往往是不由自主的。的确很难找到一本同样坦率的日记，其坦率程度常常达到无情的地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莫理循虽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但是他从1899年开始保存一份正式的日记时起，就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作用和他的文件的历史价值。尽管他的文件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写下的，他仍明确立下遗嘱，要在他死后把他的文件存放在一所向学者们开放的图书馆里，因为“它们是远东历史上一段饶有趣味的用亲身感受写下的当代记录，是对历史学家们有价值的”。

他的文件的另一部分是备忘录。在莫理循的文件中有两类备忘录：一类是为莫理循自己用的，可能是为了写自传而做的笔记，那本自传他虽早已动笔但一直未完成；另一类是有关时政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备忘录，大部分是在他受中国人聘用期间为中国政府和有关团体或个人所写的。这些文件，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表述得如何坦率，都是经过周密思考、措词谨慎，照顾到每一个人 and 每一件事的。

他的通信，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文件，兼有两者中的某些成份。这里面可能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而通信确实表明一种有分寸的密切关系。但是莫理循的信件是两种具有似乎相互矛盾特性的混合物：一方面是他的极端拘谨，另一方面是他的坦白直

率。他的拘谨有时显得过份，以致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如果随便称呼他，他很容易动气。《泰晤士报》总经理莫伯利·贝尔一再要求他在信中省略掉“先生”这一称呼，但他始终不肯省略。

在1908年，当莫理循和姬乐尔在日本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使他们的关系达到公开冲突的边缘时，莫理循在写给姬乐尔的信中说：“情绪永远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酷爱陈述事实的科学的精确性，并且绝对不受一切情绪上的或私人考虑的干扰。我唯一的愿望是说出我相信的真实情况，但我并没有忘记你曾向我引述过的话：说出真实情况并不总是好的。”

不论莫理循永远不让情绪影响他的工作的说法是否完全属实，也不论他所讲述的真实情况是否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看来他的信件有时确实由于他过份“酷爱陈述事实的科学的精确性”反而受到损害。尽管在他的信件中偶尔也有出言狂妄和过甚其词的地方，他的大部分信件实际上都是些“业务性信件”，甚至写给他的妻子和母亲这两个对他最亲近的人的信件也是如此。在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的八年期间，他写给妻子的所有信件中只有两封称得上是“带感情的”：一封是一张短短的便笺，写于1912年求婚后不久；另一封也是短简，写于他临终前几天，刊于本选集下卷内。

如果说，莫理循本人的信件缺乏他的日记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对情况的熟悉和自然的流露，有时放出引人注目的光彩——那么，他同别人的通信充分弥补了这种缺点。这些通信，有如不断涨落的潮水，他自己发出的信件或者是挑起了或者是反驳了他所经历的某些争议，在这些交流意见的争鸣中，莫理循的声音并不总是最响亮的，也不总是最动听的。

四

莫理循的通信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不仅仅由于他本人，而且还由于同他保持通信的那个圈子。在他生活和经历的不同阶段中，他同时与许多不同圈子里的人物通信。的确，莫理循可能